

## 蒋礼鸿自传



我叫蒋礼鸿，我很讨厌塾师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我出生于1916年1月9日，这一年是丙辰年，属龙，于是自字为云从。室名怀任斋，双瓶室，其实没有固定的处所，人之所在，室亦名焉。我是浙江嘉兴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的儿子。毕业于本县教会学校秀州中学。毕业后，由学校保送考进教会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来改为之江大学）国文系学习，靠借债，工读，领取奖学金读完了应修课程，得文学士学位。我的体育课最蹩脚，感谢体育老师程康初先生不和我为难，没有妨碍我获得奖学金。

之江毕业后，留校做了半年国文系助教，又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做了大约三年的国文系助教，因为婚姻问题到了四川重庆，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文学院中文系任助教、讲师约四年。我和中大的同事——现在在北京大学的吴组缃、上海师范学院的魏建猷、山东大学的王仲萃、南京大学的管雄一同在嘉陵江畔的柏溪这个山谷里相得甚欢，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学校回到南京。一年后，被中文系主任胡小

石先生解聘，回到在杭州复校的之江文理学院任讲师。1949年5月，杭州解放；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来，我先后在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和杭州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78年9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授予我教授职称，杭州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的同志继续选举我为这个室的主任。

我是旧大学国文系的学生，经史子集的书涉猎了一些，也学写旧体诗词，之江的老师夏瞿禅先生（承焘）说我“考据词章不妨兼治，锲而不舍，可到陈兰甫，凌氏《梅边吹笛谱》不足拟也”。不过我还是偏向于文字训诂和古书校释这方面。解放后，分派在语言教研组，侧重于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这样，我被看成一个语言文字工作者。

我从来没有有什么预定的写作计划，觉得有什么好写就写一点。在柏溪，由于管雄的鼓励，写了一部校释《商君书》的书，叫做《商君书锥指》，向教育部学术审议会申请学术奖励，得到第三等奖，凭此升任为中央大学讲师，那时我二十九岁。有一位专家对这部书有大致如下的审查报告：“本著作参采订正今昔诸家之说，并下己意整理古籍，颇称该备。议论亦每有独到之处。而允当朴实，一洗穿凿之弊，尤为难能可贵。《商君书》殆当推此为善本矣。”对于他提到我的议论和一洗穿凿之弊的话，我颇引以为知己。

我在语言学界滥窃虚名的一本书是《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初版，1960年出二版增订本，1962年出三版增订本，每次都都有所增益；现在四版增订本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预计今年可以出书。初版行世后，吕叔湘先生在一篇总结语言学情况的文章中提到过，以为需要有象《诗词曲语辞汇释》、《金元戏曲方言考》、《元剧方言俗语例释》和我的这本书那样的作品几十部，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洪诚、徐复先生也分别撰文评介，

其他的学者如王贞珉、张永言等也时有教益。国外则英国、苏联的汉学家A. Waley和孟西科夫也引用过这本书，日本东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在《横滨市立大学论丛》等刊物上撰文推荐，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我虽然一再订补，但是觉得，订补工作远未结束，假我余年，必将再来一个五版或更多版的增订本。

有些热情的读者说我这本东西跳出以前训诂学家考辨经史的窠臼而另辟境界，我自己多少不大同意这样的过情之誉。就方法而言，我用的还是顾亭林、钱竹汀以来的那一套，没有也不能把他们一拳打倒，两脚踢翻；我不过是把场地转移一下而已。我所揭橥的“纵的、横的系联”，难道我们的前辈没有运用过吗？至多在量上有差别而已。而我至今犹感欠缺的还是那种系联不够充分，有待博雅的读者教正。不久以前，山东大学殷焕先先生率领研究生来杭州，要我谈谈对变文字义研究的设想。我大致讲了顾亭林以来的本证、旁证，参互校核及两种系联等办法，并提出解疑、通文、证俗、探源这几种继续从事的方向。所谓“通文”，是让变文字义的解释施及其他文献或文学作品。如四版增订本中有“惭、愧”等字的一条，解为感谢，用这个解释来体味杜甫的“顾惭恩私被”、“艰难愧深情”，就觉得怡然理顺，发现了先前不注意的东西。所谓“探源”，不仅要说明此词此义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还要说明词义的相承与转变，词义与用字的异同。如我在三版本55页说的描写的“描”的语源是“貌”，段玉裁把“填”和“寘、尘、陈”之有久义贯穿起来而说“诗词内作镇，亦是此字（《说文解字注》“填”篆注）。这些，有的是前人已经探索到的，有的则有待继续探索。我之愿尽绵薄者在此，愿向大家求教者也在。

我还写了一本有关语义、语源的笔记，因清人黄生写过一本

《义府》，就名之为《义府续貂》，约十万字，已交中华书局印行。此外，我还写过一部《古汉语通论》，从文字形义到词汇，语法中的有别于现代语的部分，句逗，古代文学作品修辞，古书疑义，目录学常识等都有所论及，曾作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和函授教材由杭州大学函授部印行。文化大革命后，此书湮没不行。最近，温州师范专科学校在给我重印，为了我这部读者范围狭窄的书，有累温师专同志费去不少心力，这是我十分抱歉的。

我也写过一些有关古籍校释的文章，自己比较满意的有《淮南子校记》、《读〈论衡集解〉》、《读〈论衡校释〉》、《校勘略说》等，发表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杭州大学学报》、《安徽师大学报》上；还有《杜诗释词》、《误校七例》，将分别在《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专辑）、《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近年来，在从事辞书工作中，曾写过《辞书三议》、《辞书涉议二题》（《辞书不宜言“本字”说》、《悬断与征实》），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上；《说“通”》，发表在《辞书研究》上。

1958年开始修订《辞海》，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语词部分的修订工作。1978年12月，《辞海》编委会恢复，我担任语词部分的分科主编。1979年国庆纪念日，《辞海》合订本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礼物出版了，这是我国文化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在修订过程中，我是捣乱分子，对某些行之有效的旧说要提出异议。例如“胖胖”这一条，原来是依朱起凤先生《辞通》解为笑声的，我以为应是勤苦劳碌的意思，闹到1979年5月的修订本才改如我说。1977年，《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开始，我被邀参加，后来谬膺副主编任务。当时我写了《辞书三议》，提出要做到会通、逸义、辩证三点，吕叔湘先生来信说：“此文所提三点，实大词典成败所系。”从实践看来，这些要求提得高

了一些，现在还只能作为要求达到的方向。

在教学方面，我有一些学生当了高等学校古代汉语教师或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可以靦颜说“种成桃李”了。我写了一些与文学作品搭界的小东西，想编成一本小册子，名为《咬文嚼字》，但不知送给哪里出版好。我还是一个帮闲，一些朋友的作品如王季思先生校注的《西厢记》，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徐朔方先生校注的《牡丹亭》和编校的《汤显祖集》，都吸收了我的一些或大量意见在内。我的学生或同行寄来的文章，我也多数提过意见，不以为厌；但近来因事务忙迫，则有应有不应了。

我在之江念书的时候，老师钟钟山先生（泰）的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臞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益修先生（昂）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对我有所熏陶、启发，惭愧的是践履不及三师的百一。同学任铭善，我进之江时他是四年级生，一年后毕业，留任助教，我又成了他的学生，听他的文字学课。此后，我们俩一直处于师友之间，其中的一人写了些什么，就让另一人磨勘，处得很好，这就是我斋名“怀任”的由来。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以胃癌去世。他和我的一个学生，现任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陈从周，找我把他的诗词遗稿写成一个《尘海楼诗词》长卷，我附上了一个跋和一首六言诗，那诗是：“**生恨才情溢量，死者文章作棱。莫听邻人吹笛，子期白发先生**”。后来陈以此卷求得叶绍钧先生题上一首《浣溪沙》词，是：“**曾共西湖酒数卮，骚心领略廿年迟，与钦深慕叹无施。蒋钞何殊吴札剑？陈藏长托子期悲，交情生死见今时！**”读之慨然，难已思旧之情了。